

【哲学与文化】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4.004

# 关于瞿秋白幸福观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杨伟荣, 张方玉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站在幸福观角度对瞿秋白心路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而瞿秋白幸福观的存在性、研究的必要性和发展的前瞻性,自然成为论述的关键和重点。这需要在分析以往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中的幸福观意蕴,并阐述其幸福观隐含性和存在性的合理因素。结合研究现状和社会现实,进一步从瞿秋白与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顺势中,瞻望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发展必然性和内在统一性,从而梳理出一条瞿秋白幸福观研究的科学线条和合理思路。

**关键词:**瞿秋白;幸福观;存在性;隐含性;前瞻性

**中图分类号:** G 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4-0018-05

纵观近几年,瞿秋白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成果更可谓丰富。研究者们从生平考究、思想解读、著作文本研习等各个角度发掘出了瞿秋白研究的新的学术价值源。他们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整体专著形式,还是单篇论文形式,都力求更加客观、全面,并且准确地展现瞿秋白的思想和形象。这种状况表明,瞿秋白的思想及其论述,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在中国的重要创新及发展。这突显了瞿秋白研究意义的重要性和研究空间的广阔性。因此,研究水平就需要不断提升,研究领域也需要不断扩展。从文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到经济学、心理学领域,瞿秋白的形象和思想研究都渐趋立体化和多元化。但需要注意的是,真正从伦理学领域针对瞿秋白幸福观的研究却少之又少。这并不是说,瞿秋白的幸福观研究没有进入学界研究者的视野。一直以来,不少学科领域的研究都涉及瞿秋白的人生观和哲学观,幸福观作为人生观的一种就隐含其中,但缺乏一种系统的、成熟的、统一的观点论述。以往的相关述要或综述自然也就无法深刻地揭示相关的基础性资料和理论成果,但其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容忽视。现将各学科领域研究涉及之处及相关要点作简要分析和论述,以期推动该问题研究的深入。

## 一、瞿秋白研究中幸福观的存在性分析

每一学科领域的研究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方法问题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对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的把握上,更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认识上。要想更加客观、全面且准确地展现瞿秋白的思想和形象,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瞿秋白作为历史、革命史、党史研究,以及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研究的重要对象,涉及的领域甚广,包括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艺、文学多个方面,因此并不能归于某一学科,而是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思路的梳理大致都遵循了“具体年岁”和“事迹成就”两条线路,至于分著作或文本进行研习,同样也是依据具体的年份和相应的成就来详述,只能算是两条线路的应用结合。“具体年岁”线路以丁言模、刘小中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和蔡桂林的《瞿秋白传》为典型,“事迹成就”线路则以王铁仙和张琳璋的《瞿秋白传》、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选编的《瞿秋白研究新探》为典型。至于对线路穿插结合的应用则更为广泛,著作、论文兼而有之。而相应领域的研究,则在方法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力图突破过往解释的窠臼,真正

收稿日期: 2016-03-22

作者简介: 杨伟荣(1990-),男,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幸福观;张方玉(1977-),男,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幸福观与道德哲学。E-mail: yangweirong121@qq.com

呈现出瞿秋白研究的综合、系统、开放、多向度、立体化的姿态。正如杨奎松教授在《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所说：“我们的评价系统严格说来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对立了，但是留给瞿秋白，同样也是留给周一良这些知识分子的空间，依旧是那么狭窄。”<sup>[1]5-6</sup> 瞿秋白文人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始终是影响该研究的两种重要倾向。文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都无一例外地徘徊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从顾明道的《毕克伟和美国的瞿秋白研究》、张宏的《日本的瞿秋白研究综述》、向葵阳的《西欧与澳洲的瞿秋白研究述要》以及何霞的《海外瞿秋白研究概论》来看，国外瞿秋白研究者们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文学和政治学领域。这可能跟国际舆论环境和对瞿秋白的身份定位有很大关系。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日之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杨尚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纪念会上对瞿秋白做出了高度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sup>[2]464</sup> 这自然是对瞿秋白烈士战斗一生、光辉一生的高度评价，但也是对瞿秋白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文学家身份进行的双重界定。作为学界研究和学术讨论，就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思维的扩散与既定理论的升华。文学、史学领域研究都得出：瞿秋白出生于“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族，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受“五四”新潮的洗礼，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新时代的自由神”的吸引，前往“赤都”莫斯科考察学习，并且在那里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并逐渐成长为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贞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因此，瞿秋白自己所谓的“两种意识”、“二元人格”之间是有一个复杂的成长和发展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对于全面、准确理解瞿秋白的阶段性情感、区域性思想和整体性形象都至关重要。同样也是这个过程才成就了瞿秋白“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瞿秋白经历的这个迷茫、挣扎和奋争的过程，不仅仅是其文学思想发展、政治思想成熟的过程，同样也是幸福观凸显的过程。

瞿秋白关于幸福论述的可查考性文献资料的确非常少，相反，关于瞿秋白痛苦和悲剧性人生的

阐述却很多。但这是不是就代表瞿秋白没有幸福观可言？中国社科院的陈瑛研究员在其著作《人生幸福论》中曾批驳“苦乐不能并存，幸福之人无痛苦，痛苦之人无苦乐”<sup>[3]233</sup>的论述。他在书中以陈觉烈士的事迹为例讲到：“当自己为人民尽到了应尽的义务，死了心里也是踏实的，没有为了一己之生而背叛革命事业，他在理智上是自豪的。”<sup>[3]234</sup> 陈瑛认为：身之苦乐与心之苦乐、情之苦乐与理之苦乐，常常会交织在一起，出现苦乐交叉并存的情况。因此，有时候“追求幸福的人”和“幸福的人”并不等同。正如罗尔斯所说：“无私奉献于一个正当事业，或献身于发展他人的幸福的人，在正常意义上不被看作是追求幸福的人，说圣者们和英雄们或那些具有明显意义上的超越本分的生活计划的人们是追求幸福的人将是一种错误，然而圣者们、英雄们以及在意图中承认正当和正义的约束的人们，当他们的计划实现时，他们事实上是幸福的，虽然它们不追求幸福，但是在实现正义的要求和他人的幸福时，或在获得他们所仰慕的美德时，却是幸福的。”<sup>[4]537</sup> 罗尔斯认为：“幸福包含某种活动成就和对结果的合理性确信。”<sup>[4]535</sup> 马克思认为：“能使最多人得到幸福的人物，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sup>[5]459</sup>，“那些为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sup>[5]459</sup> 瞿秋白无疑是这样的人，瞿秋白在革命运动和思潮的成就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何止用“合理性确信”来比量，瞿秋白从“黑甜乡”到“饿乡”，历经迷茫与苦痛去寻求“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真理和经验，“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所以今天我们站在幸福观的角度上来审视这位中国早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文学家，他确实是幸福的人，或许他从来都没有追求过自己的幸福，但他的幸福却是独特的，是“难与不知者道”的，可又不能说是独自的，因为它是值得作为经验学习和后人赞扬的。

## 二、以往研究成果中“幸福”的隐含性分析

目前学界对瞿秋白文学、文艺思想和政治革命理论的研究都比较透彻，然而对其中涉及的幸福观概念的材料发掘和理论阐述还不够深入。其中相关文献的探究价值自然不容否定，瞿秋白幸福观研究

也需要以此为基础和参考,来获得理论支撑和发展基点。以下是对以往研究成果中隐含幸福概念的相关分析。

原拟在无锡“避世”的瞿秋白好像“精神上被判了无期徒刑”。社会黑暗、民生凄惨、国家沦陷危机的现实不断刺激着他的心灵,使他发现无数“?”的同时,探求社会出路的内心要求也愈发强烈<sup>[2]33</sup>。1916年冬天,瞿秋白前往武昌时曾感叹:“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着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饥渴似得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sup>[6]24</sup>可见,自身心灵的痛苦和渴望追求真理的心态都折射出瞿秋白“避世”时的内心矛盾,他总是被“内的要求”控制着,却“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他心中一直存在着“不可思议的谜儿”、“变成了一个阴影朝朝暮暮守着”的他<sup>[7]99</sup>。刘岸挺先生说这个“谜”变幻的“阴影”,其实是令他躁动不安的理想与抱负。其实这种理想和抱负源自他对恶浊社会的疏离和人民的悲悯,这也就决定了这种理想和抱负在不断加剧其疏离程度的同时,也会衍生自身对“理想抱负合理性确认”的幸福。

《“儿时”》一文曲折地表达了瞿秋白真实的思想情感。一方面表达他想念“儿时”的意气风发;另一方面表达他对“最无情斗争”的厌恶,以及自己备受逼迫的痛苦<sup>[8]402</sup>,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着对求知的快乐和追求的执着。《骷髅杂记·序》所云“骷髅”却也“不肯沉默”,其中所说“骷髅”的话、“鬼话”、“无聊的记录”、“对于鬼的……也许又都是不新鲜的”<sup>[9]125</sup>等语言,与“多余的话”可谓异曲同工。《多余的话》中说:“一生的经历都已经用尽,剩下一个驱壳。”<sup>[10]35</sup>以及所附《未成稿目录》中《油干火尽时》的文题与《骷髅杂记·序》中的“肉已经烂光,血早就干枯了”<sup>[9]125</sup>之间的痛苦无奈之情清晰可见。然而狱中所写《多余的话》和准备写的“未成稿目录”所列40篇文章,以及万一有可能保存生命的时候还想再做的事,就是《“儿时”》中所说的想“天天”为大众“干一些事情”,这又隐含着积极乐观向上情绪的一面<sup>[2]435-436</sup>。

在生命即将终结之际,瞿秋白仍不忘继续自己“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理想和事业。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事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sup>[5]459-460</sup>所以,你可以说瞿秋白是倍感疏离与痛苦的,但也可以说,他是始终执着与幸福的。他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与信仰,同样也幸福于自己的理想与信仰。

“……这两种意识在我的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sup>[10]13-14</sup>“‘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倦怠、疲倦,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继续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的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sup>[10]15</sup>这些曾是对瞿秋白革命坚贞和共产主义忠诚产生怀疑的“铁证”。然而表面之词和显性情结背后的隐行情结值得深思,《多余的话》中一边批判自己消沉情绪的同时,一边坚守自己的革命立场。瞿秋白在表述自己二元人格对立、无产阶级意识始终没有胜利的同时,也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sup>[10]20</sup>,“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既然走上这条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sup>[10]13</sup>在《多余的话》中他严申最多的,依旧是他的政治生涯。他对革命的热忱、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都是极为坚定的。瞿秋白的“二元意识”注定在衍生疏离感的同时,不断加剧其痛苦程度,而在疏离程度极致时,又会激励其奋争。疏离与幸福、快乐与痛苦,交织而就,相辅相成。

瞿秋白曾评价自己“或者自以为很有幸福呢。只剩得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呵,苦得很哩!”<sup>[6]3</sup>这种幽默式的自嘲不正表现出瞿秋白自己对幸福与痛苦相生相长、相辅相成的逻辑机制关系的认知么?正如日本心理学家宫城音弥在其著作《情感与理性》中也写道:“既有‘快乐’而不幸的时候,也有痛苦而幸福的时候。”<sup>[11]4</sup>所以我们在研究瞿秋白

如何痛苦而奋争的时候，也应看到他如何因理想而幸福。

### 三、瞿秋白幸福观研究的前瞻性分析

近几年来，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逐步成为瞿秋白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随即产生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就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瞿秋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成果颇丰。

在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面，以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阶段和主要内容为主。关于瞿秋白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阶段，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以余锐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三阶段说”和秦正为在《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的“四阶段说”为“阶段论”典型代表。关于瞿秋白马克思主义观的具体内容，学者们也进行了阐述，以胡丰顺的《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周一平、林祖华的《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特色》为“内容论”的典型代表。在瞿秋白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方面，学界大体形成了四种观点，即“四点说”、“五点说”、“六点说”和“八点说”<sup>[12]90-92</sup>。喻嘉的《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四点说”的代表，吴汉全的《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五点说”代表，余锐则在吴全安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点说”，秦正为、夏祥鹤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提出“八点说”。学术界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学者们从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传播，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胡为雄的《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以及卜祥记的《瞿秋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承先启后的哲学家》都阐述了瞿秋白作为一个传播者角色的贡献，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播与创新——重读瞿秋白》则在肯定“传播者”的基础上针对“创造者”角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李佩环的《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和左乐平的《论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则是以瞿秋白在构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成就、地位为核心阐述其卓越贡献。至于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方面，以谢建芬的《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霍广虹的《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余曲和李俊的《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特征》为主要代表。他们从思想、内容、地位、作用等各个方面阐释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由此可见，瞿秋白与马克思中国化的研究已逐渐系统化并成为一种趋势，但是主线意义上的系统化研究应该有相关著作问世，而目前的成果大都以论文形式呈现，显然系统化程度不够高。而且瞿秋白与马克思中国化的研究，应该在时代化、大众化基础上，不断拓展研究空间。所以这种系统化其实并不完善，这一趋势尚需不断深化和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拥有全面、科学且极具实践意义的幸福观，而瞿秋白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转变，也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幸福观作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自然不容忽视。因此，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方面的研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拓展层面和拓展空间，自然应当成为此研究大势之所趋。对瞿秋白幸福观的探究，作为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意义和价值也就不言而喻。纵观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几乎等同于其他国家一百年的变化，随着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均会出现许多不能完全调试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面对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逐物拜金的诱惑，理性泯灭的危机，以及精神世界的失落和空虚，人们不免会感到茫然和困惑。人生的幸福、快乐为何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增加，反倒是成比例失落？有人甚至发出“生活乏味”、“意义失落”等感喟。因为人们本以为有钱就是幸福，有权就会幸福，但当这些东西得到之时，烦恼、苦闷、空虚也随之增多。对此，他们寻不着根源、找不到答案。由此引发了与社会的疏离和与幸福的距离，整个社会存在着这种“断裂”的趋势，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也随之开始出现偏差，人类物质活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已由实现幸福的条件转变为支配、统治人本身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的幸福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站在现实的高度,对“幸福”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和瞻望前沿。

隐含性的基础加上存在性的依据,最终形成研究发展前瞻性的分析。探析瞿秋白从“避世、厌世之疏离情结”的士阶层文人,到“共产主义人间化”的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中幸福观的生成过程,对于拓展、深化瞿秋白研究的纵横,深入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认识,梳理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缓解社会转型期的疏离矛盾,从而形成系统的幸福认知、进行理性的幸福追求,都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杨奎松.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2] 王铁仙. 瞿秋白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3] 陈瑛. 人生幸福论[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 [4]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5] 马克思.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7] 刘岸挺. 忏悔的“贵族” “贵族”的忏悔——再论瞿秋白《多余的话》[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32-36.
- [8] 丁言模,刘小中. 瞿秋白年谱详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9] 瞿秋白. 赤都心史[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 [10] 瞿秋白. 多余的话[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
- [11] 宫城音弥. 情感与理性[M]. 晋学新,穆利琴,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 [12] 刘德军,胡云. 近十年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90-94.

## A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the Study of Qu Qiu-bai's Happiness View

YANG Wei-rong, ZHANG Fang-yu

(Marx Institut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Given that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study Qu Qiu-bai's inner journe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happiness view, the attention of the critical discourse is paid to the existence of Qu's happiness view, the necessity of research and the foresight of the develop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appiness view about the meaning, the implication and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its existence. With 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and social reality, it explores the inevitability and integ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s happiness view and the sinicization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appiness view to attempt to find a way to study Qu's happiness rationally and scientifically.

**Key words:** Qu Qiu-bai; happiness view; existence; implication; prospective

【编辑 吴晓利】